

红色中国网档案（一）

目录

土山毛主席纪念馆举办《毛主席革命的家庭》图片展	2
远航一号致编辑部（关于红色中国特稿）	14
远航一号致编辑部（路石同志请求退出红色中国网编辑部）	15
左向前致编辑部（关于红色中国特稿）	16
燧鸣致编辑部（关于红色中国特稿）	19
远航一号致左向前、燧鸣（关于红色中国特稿）	20
路石致编辑部（路石同志请求退出红色中国网编辑部）	21
关于红色中国网的工作及与路石同志的分歧	27
要坚决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做斗争	32
远航一号致编辑部和路石同志（关于本期红色中国时评的说明）	36
路石致编辑部（关于本期红色中国时评的说明）	45
远航一号致编辑部和路石同志（关于本期红色中国时评的说明）	49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

不同于一般穷苦人家的孩子，毛家22亩土地不仅能够养活父母和毛泽东三兄弟，还能有些盈余供他们读书。但父亲只让毛泽东念两年书，他认为学会了识字和算数记账就够了，再念下去既浪费米钱，更浪费劳力。毛泽东却把书念进去了！他发现韶山冲外的世界更精彩，有比坐狗良田更有趣的东西。

他从书中知道了，就在他刚出生几个月的1894年7月（甲午年），爆发了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其结果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泱泱大国，何以被小小倭寇所欺辱！不论这对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就是对那些略通文史如毛润之般的小儒生而言，也是不可接受的奇耻大辱！

知耻而后勇，知弱而图强。放眼世界，国人自当猛醒时——泱泱大中华已经被后起的帝国列强几近蚕食。然而，国家积弱，国民愚昧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孙中山提出的强国富民之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无疑成为当年凝聚中国一切进步力量的纲领口号。当时的毛泽东就曾自称是“三民主义信徒”、“孙中山的学生”。

然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爆发接近十年之时，中国仍然无力摆脱被列强瓜分的命运。1919年1月，一次列强分赃的所谓“巴黎和平会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间正在进行中，而且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殖民特权竟然转送给25年前甲午战争刺痛中国人心的日本国。是可忍孰不可忍！伟大的爱国五四运动爆发了，它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的舞台，而无需完全仰仗中国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来改变中国的命运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给无数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仁人志士送来了希望——走武装工农，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毛泽东作为主要舵手，开启了无产阶级创造自己历史的航程。

毛泽东，一个伟大的名字。他曾以自己名字的笔画（繁体）“二十八画生”招募革命志士；在他二十八岁时同平均年龄二十八岁的十二名代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领导中国人民，历时二十八年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资产阶级未能完成的革命；再历时近二十八年，把中国建设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他的一生始终伴随着近现代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进程。

他的家庭是伟大的。他的革命家庭正如中国革命的大家庭一样，英勇而悲壮；他的革命家庭是红色中国的缩影，是矗立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一座丰碑，正如中国人民的革命是世界革命人民的丰碑一样。

红色中国 编辑委员会 编

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五日

土山毛主席纪念馆举办《毛主席革命的家庭》图片展

（“红色中国特稿”，左向前 2015 年 2 月 26 日发布）

2015 年 2 月 16 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正是家家户户贴春联、挂灯笼，喜迎新年之时，在河南省方城县的土山毛主席纪念馆里，村民们提前敲响过年的鞭炮，用老百姓朴素而热烈的方式，迎来了人民群众翘首以盼的“毛主席革命的家庭”图板展，在新年之际将他们心目中的自家人迎进寻常百姓中。

2015 年是土山毛主席纪念馆建馆 10 周年，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向普通劳动群众更为全面地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他们专门新建四间展室，希望能以图片展板这种形式形象地再现“毛主席的革命家庭”，让更多的人了解毛主席及其亲人们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无私无畏的牺牲和贡献。在全致力于扎根工农、服务群众，宣传马列毛主义思想的“红色中国”编委会有感于广大劳动人民这种值得称道的政治觉悟和阶级情怀，更因责任感驱使，特地为土山毛主席纪念馆编辑制作了这套展板。在全国众多毛主席纪念馆中，这也是首次客观公正地表现了包括江青在内的毛主席的革命家庭。



群众在《毛主席革命的家庭》展览内容之一《三十八年得力助手江青》前驻足感怀

毛主席的家庭是伟大的。他的革命家庭正如中国革命的大家庭一样，英勇而悲壮；他的革命家庭是红色中国的缩影，是矗立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一座丰碑，正如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丰碑一样。

始建于 2005 年的土山毛主席纪念馆，是在河南南阳方城县土山村农民徐保卿等人倡议下，由当地群众捐款捐物、义务劳动，在土山村外的一座荒岗上自发修建起来的。建馆过程中，困难重重，曲折颇多。尤其是 2011 年，几乎遭到了“勒令拆除”的命运。但当地群众坚信纪念毛主席没有错，信仰毛泽东思想没有错，向往社会主义没有错。他们顶住压力，勇于斗争，善于斗争，广泛动员，又获得海内外广大进步人士支持，最终赢得了保卫土山毛主席纪念馆斗争的胜利。



修建土山毛主席纪念馆的发起人之一土山村农民徐保卿

红色中国网当时曾作为首家网站进行专题报道，向全国人民宣传介绍河南和土山广大群众热爱毛主席的朴素阶级感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毛泽东旗帜网（大地微微网）、东方红网、中国红旗网、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团体和全国及世界各地众多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也纷纷声援支持，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土山毛主席纪念馆”保卫战。

由于这次左翼群众自发运动的影响之大，发动群众之广，使得《南风窗》杂志、香港《东方日报》、美国之音、日本《读卖新闻》等海内外资产阶级媒体也多有关注。

截止今天，这里虽然仍只是一座普通的农家院落，简单的建筑装饰与官方的楼堂馆所相比，可谓简陋至极，但因其厚重的红色氛围，已经成为十里八乡，乃至周边县市人民群众自己认定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逢年过节，尤其是每年的9月9日、12月26日，人们都会自发来到这里，纪念人民领袖，感怀革命传统。



《毛主席革命的家庭》（之一）前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

不同于一般穷苦人家的孩子，毛家22亩土地不仅能够养活父母和毛泽东三兄弟，还能有些盈余供他们读书。但父亲只让毛泽东念两年书，他认为学会了识字和算数记帐就够了，再念下去既浪费米钱，更浪费劳力。毛泽东却把书念进去了！他发现韶山冲外的世界更精彩，有比坐拥良田更有趣的东西。

他从书中知道了，就在他刚出生几个月的1894年7月（甲午年），爆发了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其结果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泱泱大国，何以被小小倭寇所欺辱！不论这对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就是对那些略通文史如毛润之般的小儒生而言，也是不可接受的奇耻大辱！

知耻而后勇，知弱而图强。放眼世界，国人自当猛醒时——泱泱大中华已经被后起的帝国列强几近蚕食。然而，国家积弱，国民愚昧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孙中山提出的强国富民之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无疑成为当年凝聚中国一切进步力量的纲领口号。当时的毛泽东就曾自称是“三民主义信徒”、“孙中山的学生”。

然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爆发接近十年之时，中国仍然无力摆脱被列强瓜分的命运。1919年1月，一次列强分赃的所谓“巴黎和平会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间正在进行中，而且把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殖民特权竟然转送给25年前甲午战争刺痛中国人心的日本国，是可忍孰不可忍！伟大的爱国五四运动爆发了，它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的舞台，而无需完全仰仗中国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来改变中国的命运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给无数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仁人志士送来了希望——走武装工农，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毛泽东作为主要舵手，开启了无产阶级创造自己历史的航程。毛泽东，一个伟大的名字。他曾以自己名字的笔画（繁体）“二十八画生”招募革命志士；在他二十八岁时同平均年龄二十八岁的十二名代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领导中国人民，历时二十八年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资产阶级未能完成的革命；再历时近二十八年，把中国建设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他的一生始终伴随着近现代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进程。他的家庭是伟大的。他的革命家庭正如中国革命的大家庭一样，英勇而悲壮；他的革命家庭是红色中国的缩影，是矗立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一座丰碑，正如中国人民的革命是世界革命人民的丰碑一样。

红色中国编辑委员会编制

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五日

革命的家庭——严于律己的革命后代

毛泽东去世后，李讷有过一段异常孤独、困难的时刻。那些年由于母亲江青在京北远郊秦城监狱服刑，她常常要花整天的时间乘坐公共汽车去那里探监。与前夫分手后她一个人带儿子生活（毛泽东有言在先：希望子女不要找高干子弟做对象。李讷30岁时与工农家庭出身、高中毕业、在中央办公厅北戴河管理处做服务员的小徐相识。1970年相识，1973年高婚，育有一子）。1984年在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夫妇的帮助下，李讷和王景清再婚，过着老百姓平静自由的生活。他们都是自

己去市场买菜，冬天里也像普通人家一样买上几百斤大白菜，推着拉板车回来腌酸菜。不少人听说毛主席的女儿买大白菜讨价还价，禁不住唏嘘不已。他们家中没有值钱的家具陈设，就是书多，专门有一间库房，大多都是江青留下的书，很珍贵，有两万多本。客厅一排书橱上面放着父亲毛泽东母亲江青的照片，还有一张在延安爸妈抱着李讷的老照片。此照片是李讷最喜欢的一张。李讷的独子王效芝，自尊自强，不喜欢抛头露面。毛泽东去世后，李敏李讷没有继承毛泽东一分钱的遗产，无论是毛泽东在世时还是去世后，两个女儿都没有享受到一点特权。在随后的改革开放时代，李敏和李讷谨小慎微地依靠着那份工资生活着。李敏常说，父亲教育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



▲李讷和王景清参加社会活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于毛主席诞辰纪念日，李敏、李讷（左）姐妹俩在家中纪念父亲。



▲从父母辈开始，她们就已经习惯于过简朴的生活了。不追求物质享受，的确是她们这个革命家庭的优良传统。



▲1954年毛泽东与江青、女儿李讷、侄子毛远新合影

毛远新1941年2月14日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是毛泽东二弟毛泽民和中共地下党员朱丹华之子。毛远新文革期间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深得毛泽东的信任。1976年9月9日主席逝世仅仅27天后（10月6日），



▲江青自己无子，把毛远新视为己出，江青称毛远新小名为小豆子。毛远新称江青为妈妈！毛泽东对此深感幸福和认可！江青始终对毛远新在生活上多方关心照顾。图为毛远新和李讷与毛泽东在一起。

以与江青走得太近为由，毛远新也同时被捕。当时的名义是“保护审查”，而这一“保护”就是整整十年，直到1986年，特别法庭判处他17年有期徒刑，在狱中备受折磨，一条腿致残。1993年10月，毛远新17年刑满后，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



▲1941年毛泽民和不满一岁的儿子毛远新在新疆。1942年9月毛泽民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一年后即遭杀害，牺牲时47岁。一同被捕的毛泽民妻子朱旦华抱着一岁多的儿子，也被关在女牢，受尽磨难。直到1946年被营救出狱。1951年毛远新10岁时被母亲送到毛主席身边，一直跟随毛主席生活学习，直到毛主席逝世，毛远新入狱。

红色中国编辑委员会特为毛主席纪念馆制作

编辑制作：陈洪涛

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五日

毛主席革命的家庭（之十二）——三十八年得力助手江青（文字内容）

江青（1914年3月5日—1991年5月14日），曾用名李云鹤，艺名蓝苹，生于山东诸城，维基百科词条称江青为“中国现代政治家、演员、文艺理论家、摄影家、共产主义者”。是毛主席的第四任妻子（江青此前曾有过两次短暂的婚姻）。

1928年，江青入济南一所戏班学戏，1929年春进山东实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1931年5月嫁给济南富家子弟表明伦，两个月后离婚，而后去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在青岛大学，她认识了大学生物系学生、共产党地下宣传部长俞启威(建国后任天津市市长、市委书记、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是现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父亲)，开始进入“共产主义文化阵线”的圈子，参加了左翼文化团体“海滨剧社”，演过《放下你的鞭子》等进步戏剧。1933年2月江青由俞启威介绍，在青岛一个码头仓库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青年支部委员。同年4月俞启威被捕后，江青去了上海，继续参加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9月，江青被捕。同年12月出狱后，1935年3月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改名“蓝苹”，因主演话剧《娜拉》受到好评。随后在《自由神》及《都市风光》两部电影中担任配角。期间认识了评论家兼编剧唐纳，并于1936年和唐纳在杭州举行了集体婚礼。数月后发生婚变，二人即分道扬镳。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江青离开上海于8月到达延安。

1937年11月江青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江青担任戏剧系指导员，演出话剧《被糟踏了的人》、《锁在柜子里》。8月改演京剧《打渔杀家》得到肯定。后调任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照顾毛主席起居（当时贺子珍已于一年前出走苏联）。1938年11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江青和毛主席结婚。1940年生下女儿李讷（李姓取自毛泽东的化名“李得胜”）。

江青虽说高小都没有毕业，但她聪明好学，爱好文学，擅长文艺，有文化修养。毛主席喜欢读《红楼梦》，她也钻研《红楼梦》，后来能够对《红楼梦》进行种种评论，甚至被称为“半个红学家”。她跟毛主席有一个共同爱好是京剧。她当时在延安演《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就深得毛主席喜欢。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文革中《红灯记》等八个样板戏，也完全是江青发现、修改并提高的。她对每个剧组的班子组成，剧本的改编，舞台的设计，演员的选配，演员的唱腔、动作、服装，音乐的配置等，都曾不厌其烦地亲自去抓，力争做到精益求精，不允许有任何一点瑕疵。京剧四大名旦之一，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说过：“江青确是一个知音，艺术上是个内行。”

江青的正楷字体写得很有功底。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时，毛主席就指定江青教岸英楷书；李敏和李讷曾向父亲请教书法，毛主席也说，去找妈妈，她的字比我写得好。在毛主席身边，她开始模仿“毛体”。毛主席写文章、写信总要圈圈改改，写毕需誊抄一遍发出。在事务繁忙的时候，毛主席无暇誊抄，便叫江青代劳。江青模仿“毛体”，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毛主席在1949年4月2日写给傅作义的信，便是江青用“毛体”抄写的。这封信被傅作义当做“毛泽东亲笔手稿”珍藏。在“文革”后，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毛泽东事迹展览”时，还曾经把这份江青的抄件误当作“毛泽东手稿”公开展出。江青手书毛主席诗词《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这四幅作品就长期被人误认为是毛主席的手迹。

据延安时期了解江青的人坦言，江青其实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妻子。她给毛主席沏茶之后，总是把茶杯的柄朝着毛主席，便于他一伸手就能拿起茶杯。毛主席想抽烟，她马上去拿香烟，点燃之后递给毛主席。毛主席要看书，江青会迅速找到毛主席要看的书放在他的面前。江青总是把毛主席的办公室整理得井然有序，干干净净。那时候，江青很低调。毛主席的窑洞里客人很多，她给客人沏好茶，就退出了，绝不在旁边插嘴。来了外国记者或者国民党统治区的客人，江青规避不露面。有时候，毛主席也要介绍她出来，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一盘花生米或者陕北红枣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一个大姑娘。

江青对毛主席一直都很崇拜、尊重并充满感情。她给毛主席写信、谈话或在会议上发言，从来不称呼“毛泽东”或“润之”，总是称呼“主席”。她经常说：“我是主席的学生、哨兵。”当然夫妻间难免有个磕磕碰碰的。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她还会织毛衣、剪裁衣服，并做得漂亮而合体。因此，她的着装很讲究，总是显出娇好的身段。毛主席不修边幅，过于节俭，有时顾不到形象。江青则爱整洁，注意穿着，有时管管毛主席。毛主席有时领情，有时不领情。江青爱唠叨，说毛主席改不了农民习惯之类的话。毛主席听了很生气：“我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

毛主席的逝世对江青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江青画传》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1976年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当9月9日零时刚过，才10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张玉凤奔出主席卧室，疾步走向毛主席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报告噩耗。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后来，姚文元曾经这样描述他在现场的所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姚文元所述应该是真实的。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38年的夫妻感情。

陈永贵曾经回忆说：

“毛主席病重的时候，亲自给他身边的人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恢复了常态，吆喝大家打扑克等待火车。我亲眼见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她虽然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这不乎合事实。”

江青被捕后，在身体日趋虚弱的时候更常常想起毛主席。她的枕边保存着毛主席的手迹。在衣服上别着毛主席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她与毛主席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主席的诗词或阅读毛选。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曾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主席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了拒绝。

1991年江青服刑10年后自杀，终年七十七岁。新华社20天后的6月4日才电告，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自杀前一天，也就是1991年5月13日晚上，她曾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潦草地写了一句话：“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据称，江青是选择“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二十五周年前夕自杀的。她还在这张报纸上认真地写道：“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江青字”。这是她在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最早报道江青自杀身亡的是 1991 年 6 月 1 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称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上吊自杀”。《时代》没有透露消息的来源。消息还说，江青自杀是因为“不愿忍受咽喉癌的痛苦折磨”。

日本《文艺春秋》周刊曾发表了据说是江青留下的“绝命书”：

“毛主席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多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现在被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吞并了领导权。主席除刘未除邓，后患无穷，国祸民殃。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见你了！”

毛主席还在世时，江青就曾对张玉凤说过：“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这个难些。”

面对生命危险声言不怕死，这不能不令人想起杨开慧被杀害前写下的“遗书”。江青到底是“反革命”还是革命烈士，其是非功过，不是个别人可以擅下定论的。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相信人民自有公论。历史真相终将会大白于天下。

江青

革命的家庭——三十八年得力助手江青



江青（1914年3月5日—1991年5月14日），曾用名李云鹤，艺名蓝苹，生于山东诸城，维基百科词条称江青为“中国现代政治家、演员、文艺理论家、摄影家、共产主义者”。是毛主席的第四任妻子（江青此前曾有过两次短暂的婚姻）。

▲江青延安骑马照

1928年，江青入济南一所戏剧学校，1929年春进山东实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1931年5月嫁给济南富家子弟姜明伦，两个月后离婚，而后去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在青岛大学，她认识了大学生物系学生、共产党地下宣传部长俞启威（建国后任天津市市长、市委书记、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是现任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父亲），开始进入“共产主义文化阵线”的圈子，参加了左翼文化团体“海滨剧社”，演过《放下你的鞭子》等进步戏剧。1933年2月江青由俞启威介绍，在青岛一个码头仓库里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青年支部委员。同年4月俞启威被捕后，江青去了上海，继续参加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9月，江青被捕。同年12月出狱后，1935年3月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改名“蓝苹”，因主演话剧《娜拉》受到好评。随后在《自由神》及《都市风光》两部电影中担任配角。期间认识了评论家兼编剧唐纳，并于1936年和唐纳在杭州举行了集体婚礼。数月后发生婚变，二人即分道扬镳。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江青离开上海于8月到达延安。

1937年11月江青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江青担任戏剧系指导员，演出话剧《被糟蹋了的人》、《锁在柜子里》。8月公演京剧《打渔杀家》得到肯定。后调任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照顾毛主席起居（当时贺子珍已于一年前出走苏联）。1938年11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江青和毛主席结婚。1940年生下女儿李讷（李姓取自毛泽东的化名“李得胜”）。



毛泽东、江青与女儿李讷在延安

江青虽说高小都没有毕业，但她聪明好学，爱好文学，擅长文艺，有文化修养。毛主席喜欢读《红楼梦》，她也钻研《红楼梦》，后来能够对《红楼梦》进行种种评论，甚至被称为“半个红学家”。她跟毛主席有一个共同爱好是京剧。她当时在延安演《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就深得毛主席喜欢。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文革中《红灯记》等八个样板戏，也完全是江青发现、修改并提高的。她对每个剧目的班子组成，剧本的改编，舞台的设计，演员的选配，演员的唱腔、动作、服装，音乐的配置等，都费不厌其烦地亲自去抓，力争做到精益求精，不允许有任何一点瑕疵。京剧四大名旦之一，京剧艺



▲江青称自己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



1946年在延安与江青合影



▲江青在为毛主席抄写信件



▲1938年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结婚



▲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读报，江青教女儿李讷读书



革命的家庭——三十八年得力助手江青

术大师程砚秋说过：“江青确是一个知音，艺术上是个内行。”

江青的正楷字体写得很有功底。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时，毛主席就指定江青教岸英楷书；李敏和李讷曾向父亲请教书法，毛主席也说，去找妈妈，她的字比我写得好。在毛主席身边，她开始模仿“毛体”。毛主席写文章、写信总要圈圈改改，写毕常誊抄一遍发出。在事务繁忙的时候，毛主席无暇誊抄，便叫江青代劳。江青模仿“毛体”，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毛主席在1949年4月2日写给傅作义的信，便是江青用“毛体”抄写的。这封信被傅作义当做“毛泽东亲笔手稿”珍藏。在“文革”后，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毛泽东事迹展览”时，还曾经把这份江青的抄件误当作“毛泽东手稿”公开展出。江青手书毛主席诗词《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这四幅作品就长期被人误认为是毛主席的手迹。

据延安时期了解江青的人坦言，江青其实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妻子。她给毛主席沏茶之后，总是把茶杯的柄朝着毛主席，便于他一伸手就能拿起茶杯。毛主席想抽烟，她马上去拿香烟，点燃之后递给毛主席。毛主席要看书，江青会迅速找到毛主席要看的书放在他的面前。江青总是把毛主席的办公室整理得井然有序，干干净净。那时候，江青很低调。毛主席的窑洞里客人很多，她给客人沏好茶，就退出了，绝不在旁边插嘴。来了外国记者或者国民党统治区的客人，江青规矩不露面。有时候，毛主席也要介绍她出来，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一盘花生米或者陕北红枣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一个大姑娘。



▲江青在苏联（右一）

江青对毛主席一直都很崇拜、尊重并充满感情。她给毛主席写信、谈话或在会议上发言，从来不称呼“毛泽东”或“润之”，总是称呼“主席”。她经常说：“我是主席的学生、哨兵。”当然夫妻间难免有个磕磕碰碰的。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她还会织毛衣、剪裁衣服，并做得漂亮而合体。因此，她的着装很讲究，总是显出娇好的身段。毛主席不修边幅，过于节俭，有时顾不副形象。江青则爱整洁，注意穿着，有时曾管毛主席。毛主席有时领情，有时不领情。江青爱唠叨，说毛主席改不了农民习惯之类的话。毛主席听了很生气：“我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

毛主席的逝世对江青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江青画传》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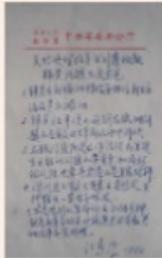
1976年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当9月9日零时刚过，才10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张玉凤奔出主席卧室，疾步走向毛主席书房，



▲这幅1961年《毛主席坐像》江青庐山摄影作品，在2013年以39.1万元拍卖



▲江青代笔，毛主席原款的《致吴国信》。吴国信为中共早期党员，1927年9月9日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时的秋收起义委员会成员，我国工人运动的老前辈。



▲江青在1966年10月10日的批示意见



▲江青书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毛泽东书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英国作家特里尔在所著的《江青全传》中说：江青看上去非常漂亮，是一个年轻温柔的女人……在延安时江青照顾毛泽东的身体、日常工作、洗衣做饭，帮助买东西，打扫房间。江青是北方人，好吃面食，而且还包得一手好饺子。不论过不过节，江青包的饺子都特别讲究形态美，有艺术细胞。不信有照片为证，连包饺子她都追求完美。不知是什么原因，毛主席天生不爱吃韭菜，所以江青包饺子还要格外注意，毛主席不吃韭菜馅。



革命的家庭——三十八年得力助手江青



▲文化大革命中的江青

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东兴报告噩耗。不过一箭之远的江青，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后来，她文元曾经这样描述他在现场所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

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她文元所述应该是真实的。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38年的夫妻感情。

陈永贵曾经回忆说：

“毛主席病重的时候，亲自给他身边的人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恢复了常态，吆喝大家打扑克等待火车。我亲眼见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她虽然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这不合乎事实。”

江青被捕后，在身体日趋虚弱的时候更常常想起毛主席。她的枕边保存着毛主席的手迹。在衣服上别着毛主席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她与毛主席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主席的诗词或阅读毛选。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曾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馆，同时要求允许李访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主席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了拒绝。

1991年江青服刑10年后自杀，终年七十七岁。新华社20天后的6月4日才电告，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自杀前一天，也就是1991年5月13日晚上，她曾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凉凉地写了一句话：“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据称，江青是选择“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二十五周年前夕自杀的。她还在这张报纸上认真地写道：“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江青字”。这是她在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最早报道江青自杀身亡的是1991年6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称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上吊自杀”。《时代》没有透露消息的来源。消息还说，江青自杀是因为“不愿忍受咽喉癌的痛苦折磨”。

日本《文艺春秋》周刊曾发表了据说是江青留下的“绝命书”：

“毛主席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多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现在被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吞并了领导权。主席除刘除邓，后患无穷，国祸民族。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见你了！”

毛主席还在世时，江青就对张玉凤说过：“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军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这个难些。”

面对生命危险言言不怕死，这不能不令人想起杨开慧被杀害前写下的“遗书”。江青到底是“反革命”还是革命烈士，其是非功过，不是个别人可以擅下定论的。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相信人民自有公论。历史真相终将会大白于天下。



▲1947年毛主席和江青在转战陕北途中



▲1947年毛主席和江青在转战陕北途中小憩



▲毛主席与江青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照，是毛主席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毛主席和夫人江青在庐山

远航一号致编辑部（关于红色中国特稿）

（2015年2月27日）

左向前、路石、其他同志：

这次方城土山毛泽东纪念馆活动，左向前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各种图片主要由路石同志编辑。事后，左向前同志在周刊上、燧鸣同志在红色中国网上分别以红色中国特稿的方式发布了消息。这些活动，在群众和网友中都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同时扩大了红色中国网的影响。我们应该为这些工作向左向前和路石同志表示感谢。

除了表示感谢以外，我也想以主编的身份对有关同志提一点意见。在特稿中，我注意到，其中提到红色中国编辑委员会对这次活动出资出人；展板上并有红色中国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字样。据我所知，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并未就相关问题，进行过讨论、表决。

有关同志在做上述工作时，主观上是要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并扩大红色中国网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件事情，如果拿到编辑部上来讨论，我想也一定可以顺利通过。但是，既然没有讨论过，没有集体通过过，就不宜采用红色中国网的名义。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治组织最基本的原则。我们现在谈不上什么组织，但是要要做好工作，也必须逐步克服自由散漫的习气。这一点，目前几位青年同志做的还不够好，这就更需要中老年同志在这方面做出表率。不经过集体批准，个人擅自行动，造成严重后果，当然绝对不允许。即使是出于好的愿望，并且确实造成了好的效果，除非出于极其特殊的情况，一般也不应违反组织原则。

当然，作为无产阶级的战斗队，组织纪律是形式，战斗员的自觉主动的阶级觉悟是基本的工作原动力。在工作确实需要时，并且确实出于集体利益时，编辑部成员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一些灵活做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般也不应违反组织原则。比如，这次活动，可以以红色参考的名义，或者以红色中国网若干编辑的名义，都更为恰当。

希望有关同志能对这个意见给与应有的重视。

远航

远航一号致编辑部（路石同志请求退出红色中国网编辑部）

（2015年3月1日）

各位同志：

路石同志过去几个月曾多次向我提出退出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问题。我曾一再挽留。今天与路石同志长谈后，路石同志仍坚持退出红色中国网编辑部。

根据红色中国网章程第十六条，经主编挽留，编辑部成员仍坚持退出的，编辑部应当予以批准。

请各位同志就此发表意见或与路石同志直接联系，征求路石同志意见。

远航

左向前致编辑部（关于红色中国特稿）

（2015年3月1日）

远航主编和各位编辑：

关于为土山毛主席纪念馆编制纪念展板及其相关报道一事，我个人做一下说明。

因为土山毛主席纪念馆一直是我在方城开展群众工作的其中一个点，所以当他们的希望我能帮助搞这种形式的展览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在普通群众中进行宣传的机会，所以就答应了。但要争取春节前搞出来，只剩十几天，时间很紧，尤其是想在里面客观公正地表现出江青的形象，改变复辟后主流宣传造成的普通群众对文革和江青的印象，那么从搜集资料到设计形式、编辑文字内容我都感觉很困难，正好路石同志和燧鸣同志到我那里，我就向路石同志说明情况请他帮助，他们二位也都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既然做就该做好，所以路石同志就答应了，燧鸣同志当时还建议有关费用可以由集体承担，路石同志也都赞同，但我当时并未完全同意这一点，因为我认为资金问题无关紧要，主要还是先编辑制作出来再说；况且真需要从国内账户支出这笔费用，还是应提出申请，由相关同志讨论通过为宜，所以这笔制作工本费用（1500元）截止目前还是我自己承担，并未从国内账户里核销。有关署名单位的问题，我最初提出的是用《红色参考》编辑部的名义，路石同志认为《红色参考》编辑部包括红色中国网都不宜用，他提议还是用红色中国图书编辑委员会的名义比较合适，我们也都同意。路石同志回去用了六天时间费了很大劲，把基本内容突击编辑完成，我们两个反复审定的时候，都感觉尽管我们在形式设计上采取了一些规避风险的措施，但有关江青的表现内容还是较为敏感，可能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而红色中国图书编辑委员会毕竟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机构，所以最终确定把“图书”两个字去掉，落款机构为“红色中国编辑委员会”。“红色中国”这四个字特意采用红色中国图书编委会、红色中国网、红色参考和红色中国周刊都使用的那四个红色毛体字，我们当时的考虑是，这样既无形中扩大了“红色中国”的影响，假若真有相关部门质疑时，又能随时撇清干系。也算进退都有余地。而且最后一幅展板还特别注明“红色中国编辑委员会特为土山毛主席纪念馆制作”、“编辑制作：陈洪涛”，这是考虑如果因图展内容给土山毛主席纪念馆带来某种压力他们又不能应对的话，这个责任就可以由陈洪涛接走，一切责任由陈洪涛承担，而陈洪涛又可以说“红色中国编辑委员会”只不过是专门为搞这个图展临时组成的一个机构。如果不是因为以上多种考虑，我和路石同志不会为此反复推敲，也没必要署上我个人的名字。这个农民自建的土山毛主席纪念馆能建成并保留到今天很不容易，经受了很大压力，我们帮他们搞这个图展，也不是为了过把瘾就算了，还

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各种可能，尽量能长期使用达到最好的效果。没办法，但凡做一点点网下联系工农的实际工作，就需要费这种心思。我想这一点同志们应该能体会得出来。

腊月二十九下午图展安装布置好，当天晚上我编发第 56 期红色中国周刊时并未写相关报道。第二周正值春节期间，我以【红色中国特稿】的名义写了《方城县土山毛主席纪念馆新年展出“毛主席革命的家庭”，首次客观公正表现江青形象》在第 57 期周刊“聚焦工农”栏目发出，也算应景文章。远航主编可能没注意周刊，在原文里我并不是以“红色中国网”的名义，没有提及“红色中国网部分编辑”，也没有说到“出资出人”。只有一处提到“红色中国网”，是介绍 2011 年土山毛主席纪念馆遭遇强拆威胁时，“红色中国网当时曾作首家专题报道，向全国人民宣传介绍他们热爱毛主席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毛泽东旗帜网（大地微微网）、东方红网、中国红旗网、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团体和全国各地众多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也纷纷声援支持，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土山毛主席纪念馆”保卫战。”（这是事实，当时这篇文章是我写的，路石同志以“红色中国网编辑方红”的名义在红中网首发，随后其他网站转发，各地左派群众发起声援，同时我做代理人向方城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最后国土局撤销了强拆的行政处罚决定。）

周刊发出后大地微微网和红旗网转发了这篇文章，也都是这个内容。但我第二天往红色中国网“群众文艺”栏目上传时，不知怎么回事，只能出来标题和摘要，显示不出内容和照片，所以就与燧鸣同志联系，请他帮忙重发一下，燧鸣同志随后微信告诉我，已重新调整，以头条发布，少部分字句略有调整。后来我上网看到燧鸣同志确实对原文做了润色调整，包括标题可能感觉太长，也有修改，把“首次客观公正表现江青形象”去掉了。其中作者写了“左向前”，头条上能看出来，我觉着还是以“红色中国特稿”为好，就把作者改了。内心希望突出江青这点，所以又加进了标题里面，其他内容我没做任何改动。但后来又上网看到标题里面突出江青的字眼还是去掉了，我想可能会是远航主编认为这样处理比较妥当，所以我也就没再做任何变动，红中网上发的这篇文章就是现在大家能看到的这个样子。我想说的意思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57 期周刊里的这个【红色中国特稿】，我并没有说是以“红色中国网”或“红色中国网部分编辑”名义在土山毛主席纪念馆做的这件事，也没有提到过“出资出人”。如果不是远航主编邮件里指出了这个问题，我还真的以为红中网上的内容，是燧鸣同志帮我重发这篇文章之后，是远航主编特意或同意这样做的修改。从我个人认识，远航主编所说的“既然没有讨论过，没有集体通过过，就不宜采用红色中国网的名义”无疑是正确的。“即使是出于好的愿望，并且确实造成了好的效果，除非出于极其特殊的情况，一般也不应违反组织原则”的提醒是应该的，我个人也一直认为必须要求自己强调组织原则，讲组织程序。虽然我们现在还谈不上什么组织，但更需要“无组织有纪律”，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能随意讲“变通”。燧鸣同志帮我编辑上传这篇文章做了一些临时调整，应该是他理解这样做可能效果更好，但像采用“红色中国网”这种名义的调整未经编辑部通过的确不妥，但他是帮我的工作，同时也是为了扩大网站的影响，出发点绝对是好的，有些情况细节应该也不太清楚。如果是我写这篇红色中

国特稿时就这样处理当然不对。不过即便如此我看到有个别重要的调整后，因为那几天的确太忙而没有和他及时沟通确认，还属于我疏忽大意，需要和大家说清楚。同时建议主编或值班编辑，还是把现在红中网这篇“红色中国网特稿：土山毛主席纪念馆举办《毛主席革命的家庭》图片展”里，“红色中国网部分编辑”改回为“红色中国编辑委员会”，把“出资出人”直接去掉较妥，或者直接重贴周刊原文算了。反正现在只有大地微微网和红旗网转载，而且都是转载的周刊原文，可以说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同时附上为土山毛主席纪念馆编辑制作的图展内容，请各位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应该政治上没有什么不妥。

另外关于“洛阳会议”的问题，昨天和红旗网的清源通电话时，也说到了这件事。他们红旗网事先也不知道，也没有派代表参加。远航在时评里对“洛阳会议”所持看法他们也基本赞同，时评他们也已转发。所以我建议远航是否把红中时评里提到这几个左派网站没有参加等地方加上“中国红旗网”。这既是事实，或许效果也会更好。

左向前

2015.3.2

燧鸣致编辑部（关于红色中国特稿）

（2015年3月1日）

致远航同志，左向前同志和各位编辑，

收到远航同志与左向前同志来信，羞愧万分，实在无地自容。

由于本人的无组织无纪律工作漫不经心自由散漫，而且事后又缺乏积极沟通，导致引起如此误解和不必要的额外的沟通，实在是百口莫辩难辞其咎。

由于我在工作中的疏忽，影响“红色中国”的整体工作，后果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

今后工作中一定要认真学习，严以律己，举一反三，忠于使命，加强使命感和责任感。

只有如此才能促进“红色中国”的整体发展，也希望同志们以我为鉴，共同发展。

特写此信向远航同志，左向前同志和各位编辑致以深刻歉意。

此致

燧鸣

远航一号致左向前、燧鸣（关于红色中国特稿）

（2015年3月1日）

感谢左向前编辑的详细说明。可能我和路石同志相互之间都有误会。关于特稿、时评中的个别文字，可照左向前同志意见修改。

关于路石同志请辞问题，请左向前和其他同志再做工作。

远航

左向前，

你的来信很及时。两篇文章中的有关文字均已按你意见修改。

关于路石是否仍留编辑部工作，还要请你和路石商量。有什么结果，转告我，我来通知编辑部。

远航

燧鸣同志过谦了。不过我和其他同志都要学习燧鸣同志自我批评的精神。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今后各位同志自觉遵守章程，按章程办事，红色中国网越办越好。

远航

路石致编辑部（路石同志请求退出红色中国网编辑部）

（2015年3月3日）

各位编辑新年好！

春季开学在即，琐事不少，没有及时为大家做出说明，请谅解。

首先说明，我退出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请求是由我本人委托主编发布的。这里对远航同志表示感谢。

其次，我说明一下这一请求的成因。

两三年前，我们（主要是我和余锋）特邀李民骐同志担任红色中国网的主编时，我就为自己安排了一个过渡性编辑的角色，希望有条件时自己可以退出这项工作。其一是我认为网站还是由有一定理论素养的人管理为好；其二，我因长期管理工人网导致腰肌劳损，计算机前坐的时间稍长就疼痛难忍，很难再胜任这项艰苦的工作。

红色中国网在远航担任主编期间，无论从网站的质量、知名度，还是编辑队伍的组织建设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甚至说是质的飞跃，远航主编在这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

一年前我先后介绍左向前和解鹿刀加入编辑部，一方面是为了适当扩大编辑队伍，同时，吸收非学者型的基层人员也是为了所谓让网站“接地气”，以服务不同群体的读者。应该说这一方针大家还是认可的。去年夏天编辑部发生了一点分歧（我认为它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先进分子之间在相互结合和

融合过程中迟早必然要发生的），最终得到圆满解决，我认为我们这个编辑部经受住了考验。既然编辑部队伍得到壮大并经受住了考验，所以当时我认为自己退出编辑部的时机基本成熟，便向远航主编和书记燧鸣提出了退出编辑部的请求，但没有被允准，他们俩认为我此时退出会对大家在心理上产生消极影响，我答应再等一等。我在等待一个既不影响集体又便于我可以自由裁决的机会。后来又跟远航就此事私下交流过几次，好像是春节前不久，远航松了口，同意我在适当的时候由我本人向全体编辑部成员提出请求。我当时闪过一个念头，就是在春节期间大家互致问候的时候提出，结果慢了一步。

即将临近春节，左向前要赶在大年三十前为土山毛主席纪念馆制作出一套展板，但他不懂在网络上搜集质量合格图片的技术（利用百度或谷歌识图技术）以及展板排版技术，我又不懂展板基本元素的设计，左向前又只给了我不到一周的时间。所以我便紧急找余锋设计底色，余锋手头工作也忙，答应两三天后设计出来。根本没有时间等了，我请求他当晚就设计，结果大约凌晨 4 点他交给了我设计的样式，我便开始没日没夜地干起来，总算按期交付了（尽管规格大小 240cmX120cm 的展板只有 15 块，但我在技术上也是个二把刀，搜集数百张图片，并从中选择高分辨率又符合要求的图片颇费周折）。最后在确定落款时，由于时间紧，我只能跟左向前做了定夺。基本原则是，由于土山毛主席纪念馆曾遭受过打击，落款不能给政府部门留下把柄，因此红色参考、红色中国网不适用，最后基本确定使用“红色中国系列图书编辑委员会”的名义（这是此前我、左向前和燧鸣三人临时确定的）。但在最后定稿时，感觉也有不妥。主要是认为图书编委会这个机构在北京还有几个青年同志以此名义为左派老同志编辑出版图书，靠它吃饭，最好不互相牵扯。最后干脆选择了模糊处理，落款“红色中国编辑委员会”，以利宣传“红色中国”，同时加了一条“编辑制作：陈洪涛”，以便出现麻烦时由陈洪涛个人负责解释和处理，而不牵扯到单位。

大约在 4 年前后创立“红色中国”时，有三块内容：图书（红色中国系列图书编辑委员会）、刊（红色参考月刊）和网（红色中国网）。我们称之为“红色中国”的三位一体。一年前又产生电子刊，起初叫“红色中国网电子周刊”，后来变为“红色中国电子周刊”，某种意义上“红色中国”成为四位一体了。这中间个别编辑多有交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交集较多。图书编委会由于至今存在 5 万元债务，实际由我担责管理，红参我是主编，同时我又是网站的编辑。这种多重的身份有时令我无所适从。我曾给远航表达过，我的这种状况令自己想“革命一把”，签个名，搞个“出格儿的”活动都顾虑重重，怕拖累了机构！但不管如何，图书编委会、红色参考，包括这次的展板，它们都是在国内公开制作出版的纸质宣传品，拿捏好合法非法的尺度就像走钢丝，并不是很好把握。而一般来说，无论效果好坏，事实上这主要都是由我来拿捏的，也是由我来担责的。

除上面所说明的情况以外，我急于退出网站编辑部的另一个原因是，避免对红色中国网站的制度建设客观上形成掣肘。

我和远航已经是 20 余年的老朋友老战友了。就红色中国网站来说，至少在作为主编的他看来，我是个“元老”型编辑。一个事物进入到一定发展阶段时，“元老”往往就成了一种阻碍力量。我倒不是说我要有意去阻碍什么，而是客观上会是个发展的障碍。比如远航比较强调建章立制，我却不那么喜欢这些。尤其是主张者不能恰当运用制度的时候，我更是不喜欢。顺便说几件我亲身体验的事情，希望对远航管理团队时有所裨益。记得两年前，编辑部要在 skype 上召开一次网络会议，确定的是北京时间的一个早晨，恰恰我所住县城小区的网络电缆在凌晨被小偷偷割了（现在的光纤电缆因为不能卖钱小偷不偷的），结果主编没有核实情况就在编辑部内宣布给我警告处分。而我认为在以制度建立权威之前应该首先调查核实一下的（当然后来核实后

撤销了)。去年在最后讨论通过章程时，我发现邮件组中大家都在表达对章程的最后意见，唯独没有发给我要讨论的草案，我还在想大概主编默认了我退出编辑部了，所以就不必让我表达意见了，结果突然邮件组中说就剩路石老同志没有表达意见了，令我尴尬不已，只好即便没有看到草案文稿，匆忙举手同意。后来经核实，原来把草案发到了我已经废弃的 yahoo 邮箱了，没有发到我在编辑组的 hotmail 邮箱里。我想，既然主编觉得我不表态是反常的现象，为何不跟我本人核实一下，而是采用这种“逼”的方法呢？这无疑给大家一个影响，主编要建章立制，那位“元老”先生却不怎么配合。再说这次批评我们无组织纪律的问题吧。起初左向前找我核实这次公开批评信的有关情况时，我还没有阅读这封信，听左向前复述信的内容后的确是一头雾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左向前已经有了说明）。对此事我的第一反映是，我不理解这种近乎于小题大做的行为；其次，我必须马上退出编辑部，我这种身份交叉容易给工作造成误解，也对主编严明纪律极其不利。

顺便再说说制度纪律等问题。

人们常说同心同德才能开拓进取。无论是干好事还是干坏事，无论是干小事还是伟大的事业，都希望有这样的状态。制度规章一般来说是消极的被动的东西，是一种形式，它主要为内容服务。一个团体没有一个灵魂（显然不是一个人，否则他死了这个团体的灵魂不就消失了），再完美的形式也只是个僵尸。我们说它的“依法治国”治理不了一个国家，因为它没有灵魂。反腐就会成为选择性反腐，法制就会成为镇压异己，离心离德就会成为必然。我们自信我们能够得胜利，是因为我们自信我们有革命的灵魂，尽管我们今天既没有党也没有枪。所以，我看某个团体有没有未来，着重于看它有没有灵魂。

我过去经历过几次批判与自我批判活动，效果总是不怎么好。不是搞成了形式主义，就是借批判与自我批判攻击对方。理由是冠冕堂皇的，采取的形式也是规范的，就是没有办法达成同心同德，有时候恰恰造成了离心离德。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没有活的灵魂，谁愿意找个死的制度来约束活着的自己呢？再先进的制度，就算是民主集中制，它毕竟也是一种僵死的制度。资产阶级老拿制度来说事，它的灵魂就是围绕着共同分割利润的。无产阶级的灵魂是什么呢？我想不外乎都是围绕着劳动者的自由发展的。正如毛主席说的，“既有高度的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局面。单纯强调制度能达到吗？表面客客气气，背后各想各的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历来强调工作作风而不是组织纪律（党组织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作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调查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是最基本的要求。尤其是对一个负有协调管理一个团体的人更是必备的。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请同志们指正：无论遇到大事小事，首先把规章制度拿出来谈事，什么少数服从多数啦，什么警告啦如此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作风。背后多多少少都包含着私人的动机。我本人首先声明，我自己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缺点，爱惜自己的自由犹如吝惜自己的羽毛。

本来只想做个必要的退出说明，结果说得有些多。说得有错误的或偏激的地方，请同志们不吝指教，直言批评。最后再多说一句，我退出网站编辑部着重考虑工作的需要，也不是有意更大家闹分裂。我不会退出“红色中国”事业，更不会退出革命。

另请编辑同志们，尤其是主编和书记考虑，我是建章后第一个请求退出的编辑，获批准后是否要考虑处理这样三件小事：

- 1、应该将该编辑在网站的管理员权限取消；
- 2、应该将该编辑的 email 从编辑组 email 中删除；
- 3、编辑退出，只在本编辑组内通知退出即可，还是需要

在网站公开说明（如果公开说明，说明文字至少应经过退出者本人过目，因为它不同于开除、除名等）。我本人倾向于我的退出在内部通知即可。如果某编辑在红中网网友中影响较大，可能需要有所交代，我不属于这种情况。

迟来的问候，顺祝大家新年愉快！

更祝愿红色中国网在远航一号主编的领导下，新年新气象！

路石

2015-3-3

关于红色中国网的工作及与路石同志的分歧

远航一号（2015年3月4日）

各位同志，我与路石同志是二十多年的老同志、老战友，这次发生严重分歧，是很令人痛心的。另一方面，矛盾和分歧也是无产阶级及马列毛左派在政治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努力认识和分析分歧产生的原因及更广泛的背景，总结经验教训，努力把今后工作做好。

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把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作为最高的原则，以此来衡量我们的一切，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计较个别团体的得失。只要基于这样的原则，一切分歧最终都可以得到解决。

下面，我想就当前工作讲几点个人想法，与同志们商量。希望以这次分歧为契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以往的成败得失，以利今后工作。

我个人欢迎编辑部所有同志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咱们要搞光明磊落，有话讲在当面。无论正确的话、可能错误的话，都可以讲。咱们不做决议，不下结论，通过讨论来达到交流思想，并在可能情况下统一思想的目的。

关于当前的斗争形势

2012年以来，传统左派（乌有之乡、旗帜网、红色中国）普遍处于停滞、衰落、重组的状况，发展不大。传统左派的群众基础主要是老工人、革命老干部、文革造反派同志。2012年以来，由于统治阶级下决心走新自由主义道路（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早已完成；2012年以后，统治阶级最后放弃了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导致传统左派在“体制内”发展的空间基本被扼杀。另一方面，老工人反对私有化的斗争陷入相对沉寂。这就造成了，传统左派原有的部分群众基础流失，对于现有的群众基础动员能力下降，而又没有、不善于发展新的群众基础的局面。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近年来，整个的阶级斗争形势对无产阶级越来越有利，对资产阶级越来越不利；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壮大，资产阶级的困难在增加。资产

阶级的困难增加到一定程度，在未来五年左右或稍长一些的时间内，发生重大变化乃至革命形势，是完全有可能的。

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主要表现在新工人队伍的壮大及斗争能力的迅速增长。其次，表现在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在马列毛或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走上了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并且初步出现了组织化的趋势。这是当前中国左派最有希望、最有活力的部分。

初步观察，在当前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政治上有觉悟、有要求的分子中（不是一般青年和一般学生群众中），马列毛左派和一般进步左派相对于自由派有压倒优势。这次关于柴静的网上辩论，左派在没有媒体、没有体制、没有经济资源的条件下取得了很大影响，也可以说胜利。

由于以上的变化，未来的重大变化，有可能导致对无产阶级有利的结果，我们应当为这样的变化做好准备。

关于红色中国网的工作

在 2012 年初至 2013 年中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红色中国网的主要工作方式是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以团结海内外进步小资产阶级为目的，以“挺薄”为工作重点，开展针对海内外网友的宣传工作。2013 年以后，挺薄斗争转入沉寂，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自由主义反动路线，红色中国网的工作进入调整阶段。

在过去一个阶段中，我在主编工作中，实际上努力执行着这样一套工作方针，那就是以红色中国网为宣传阵地，以马列毛主义为主要指导方针，同时部分反映其它马列主义倾向（如托派）和其它进步倾向（如非马列主义的或带有民族主义特点的进步倾向），及时、深入报道当前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及其发展，及时、深入报道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动向及其发展，总结中国当前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规律，并据此认识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模糊到清晰、由局部到整体的过程，以此来坚定马列毛左派胜利的信心，并在可能时指导现实斗争。

在这个过程中，红色中国网出现了网友数量大幅度减少（由原来的上万下降到目前稳定在 1000 左右）、网友质量也大幅度下降的局面。我个人认为，这种不利的变化，在

现阶段难以避免，反映了挺薄斗争失败后，部分进步小资产阶级政治热情下降的客观情况。国内封网加强，也是客观原因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红色中国网的主要服务对象，不是现有的注册网友，而是国内有影响力的马列毛左派和其他进步左派积极分子。应当通过各种手段，加强与国内有影响力的马列毛左派和其他进步左派积极分子之间的交流，使得红色中国网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为国内同志提供思想理论素材和国内外阶级斗争动态的作用。

另一方面，通过坚持目前的宣传工作，可以为下一次政治斗争高潮做准备。

关于“红色中国集体”的工作

在过去，确实存在着一个以路石同志为首的“红色中国集体”。在 2012 年以前，红色中国集体对于马列毛左派的发展壮大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然而，2012 年以来，特别是在红色中国图书计划失败以后，红色中国集体在国内的实际工作出现了停滞、萎缩的局面。

红色中国集体工作的困难表现在干部队伍萎缩，部分骨干力量流失，原有的阶级基础退化（与若干有影响力的老工人联系淡化，又没有发展出新的老工人联络点），过度甚至单纯依赖原有的左派群众基础；在遇到困难以后，又没有积极探索发展新的群众基础的方法。除了方城以外，目前还没有在其它地方取得建立和扩大群众基础的成绩。（这些情况，余锋、左向前、燧鸣等同志在不同程度上是了解的）

自红色中国集体出现时起，由于历史的原因，就形成了一套“非正规”的工作方法。组成成员从来不确定，决策机制也从来不明确。与其他传统左派团体相比，红色中国集体中“家长制”的问题不是很明显，但是大的问题还是路石同志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做，在过去，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有它的一定优点。路石同志的坚定立场和政治经验，有助于弥补年青同志的不足。但是，随着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这样的组织形式已经落后于时代，已经到了不淘汰不行的地步了。

就路石同志个人情况来说，自红色中国图书计划失败以来，始终没有找到发展和壮大红色中国集体的新的战略方向。我与路石同志、其他同志曾多次讨论，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去年，尽管我和左向前同志坚决劝阻，路石同志又差点进行新的商业冒险，最

后仅仅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才被迫停止下来。而在最关键的发展河南和周边地区群众基础方面的工作，迟迟没有展开。面对工作中的困难，路石同志没有积极动脑筋想办法，而是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消极等待的方法，或者通过将自己埋没在各种日常琐细工作的办法来回避主要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青年左派团体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路石同志又拒绝承认，采取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认定青年左派同志只能与工人阶级中的“落后群体”结合。

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承认，长期以来，我与路石同志的看法是一致的。余锋同志、燧鸣同志比我的认识要早。但是，既然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就要承认这种变化。作为马列毛主义战士，我们要为无产阶级力量的任何发展、左派力量的任何发展而欢欣鼓舞。即使在这种发展中，我们自己的团体暂时落后了，也没什么了不起，迎头赶上就是了，而不应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更不应有抵触心理。

由于“红色中国集体”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我认为应正视这个现实，即“红色中国集体”实际上已经不能发挥作用。国内群众工作怎么搞，还需要各位同志一起出主意、想办法。

我个人意见，现阶段，红色中国网主要做宣传理论工作。国内群众工作方面，加强与国内青年左派团体的联络和合作。目前，余锋同志、燧鸣同志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关于“红色中国周刊”

红色中国周刊初创时，当时很明确，是由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委托左向前同志来负责编辑、发行红色中国周刊，以转载红色中国网内容为主。我查阅历史邮件，确实是经过编辑部决定委托左向前同志的。周刊第一期，路石同志还发给编辑部全体成员，请求审阅。我作为主编，提出以后不再需要编辑部审阅。可见，当时，红色中国网对于红色中国周刊的领导关系是明确的。

自去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周刊主要由左向前同志一人负责。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也根据工作需要，我认为，应该把红色中国网与红色中国周刊之间的现实存在的关系明确下来，那就是，今后在红色中国网与红色中国周刊之间是相互独立与合作的关系。

我个人建议（这不属于红色中国网决策范围，仅仅是建议），另成立红色中国周刊编辑部，明确职责，以利于长远工作。该编辑部，可由路石、左向前、解鹿刀同志组成，也可由左向前、解鹿刀、燧鸣同志组成，也可由路石、左向前认为合适的其他同志组成。

集体决策，有利于克服个人工作的很多缺点，也有利于防患于未然。我在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今后还会继续犯错误。我如果犯了严重错误，根据现在的章程，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可以经过多数决议罢免我。据我了解，红色参考没有这样的管理办法，“红色中国集体”也没有这样的管理办法。红色中国周刊以采取何种管理办法为好（具体负责编辑周刊的同志到底对谁负责），还请有关同志考虑。

关于编辑部中的青年同志

咱们编辑部中，有许多青年同志，如水边、而东、玉表、刘杰等。过去半年左右时间，由于种种原因，这几位青年同志参加编辑部工作较少。我自己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比较了解这几位同志的苦衷。苦衷归苦衷，有些话，我还是要提醒这几位同志。

革命道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做革命工作，就像你们写博士论文一样，最怕懈怠。疏离现有工作以后，不知不觉中，革命意志就会消退，畏难情绪就会增长，再要重新加入工作，就越不知从何下手。

我知道你们都有困难，但是我们今天的困难与革命先烈的抛头颅、洒热血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我希望，几位青年同志对于这次编辑部的重大变故能够认真思考、认真讨论，并拿出你们的意见。以后，对于编辑部中发生的问题，要及时了解，及时表态。要敢于有主见，不要怕犯错误，不要怕得罪人，心底无私天地宽。

今后工作，我希望几位青年同志，有条件值班的参加值班。没有条件值班的同志，希望也能做到每天至少浏览红色中国网一次，至少查阅红色中国网编辑部信箱一次。

要坚决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做斗争

（远航一号，2015年4月23日）

近日，红色中国网编辑远航一号就工作问题致信 C 小组，并就当前工作表达了一些个人意见。这些意见是远航一号个人的，不是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其他成员的意见，也不代表编辑部集体的意见。下面是远航一号同志给 C 小组的信的主要内容：

在今日中国为数众多的左派团体中，C 小组是最早关注并参与基层群众斗争的，开辟了资本主义复辟时代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与基层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先河。到 2012 年，C 小组已经成长为与基层群众斗争联系紧密并且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的一个马列毛主义团体。

然而，自 2012 年以来，C 小组的工作逐渐陷入了动摇徘徊，在具体工作方面或者急躁盲动、或者无所作为，在主要工作方向上迟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负责人丧失了战略目标，而工作骨干又不断流失，整个工作已经陷入被动。现在，应该积极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结合当前阶级斗争的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倡新思想，尝试新办法，力争扭转目前的不利局面，争取 C 小组的新生。

目前国内阶级斗争总的形势，于工人阶级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虽然资产阶级毫无疑问在各方面居于统治地位，但是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乃至本世纪初的形势不同，目前阶级斗争的基本特点，是无产阶级在进攻，资产阶级在防御；无产阶级力量在上升，资产阶级力量在下降。无产阶级力量的上升，目前主要表现在经济斗争方面。当然，在许多具体斗争中（如目前南方沿海普遍爆发的讨薪求偿斗争、建筑业工人的讨薪斗争等），资本家仍然是很猖狂的，地方资产阶级政府在镇压工人方面依然是很凶恶的。但是，这种猖狂与凶恶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是资产阶级困难的反映，而不是资产阶级力量的反映。

有几个方面的趋势是确定的。第一，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在不断壮大；第二，无产阶级的斗争愿望和组织程度在不断提高；第三，无产阶级斗争的先进分子与马列主义和其他的进步积极分子之间的联系在不断扩大与加深；第四，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力量在迅速

增长，表现为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第五，资产阶级的困难在不断增加，表现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在不断下降。

除此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分化，其政治上比较活跃的部分在左转。这不仅表现在大量青年学生为马列主义所吸引，而且表现在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各项经济和社会要求（教育、医疗、住房、环境、基本人权等）都意味着增加资产阶级的困难，并且都不可能在中国资本主义的现有制度框架内得到满足。

上述趋势只要继续发展下去，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中国资产阶级就必然要遭遇严重的并且不可克服的困难，中国的政治形势就可能发生重大的并且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就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建立起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强大的、人民大众的反资本主义联盟，中国无产阶级就有可能取得反对资产阶级的胜利。

在当前阶级斗争的总的发展形势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大前提下，C小组的工作遇到了严重困难，除了一些客观因素以外，主要要从主观方面来寻找原因。关于这些原因，我在另外一封信中，说明了我个人的看法，此处不再赘述。

目前，在国内的各左派团体中，若干个以青年同志为主的马列主义团体和进步团体在人数规模、组织严密度、行动能力、生命力以及联系群众的程度等方面已经超过了原来的几个主要的传统左派团体，在表面的社会影响力方面也在迅速赶超。原有的传统左派团体，谁能够率先正视这一事实，率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在与青年同志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解放贡献自己应当贡献的作用，谁就有政治生命、就能取得存在和发展，否则，就有被历史淘汰的危险。

在现阶段（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中国各马列主义团体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坚持做大量的、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这既包括积极开展马列主义积极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主要是与工人相结合）的工作，也包括用马列主义思想来积极影响、教育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总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大众的反资本主义联盟而斗争。

在这个过程中，各马列主义团体要树立无产阶级全阶级的利益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目标高于一切的思想，要坚决与各种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做斗争，要坚决反对和克服

将小团体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包括打着革命旗号的个人利益）置于无产阶级整体利益之上的倾向，要在初步的阶级自觉的基础上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封建家长制，也反对个人英雄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工作的主要目的，除了用马列主义思想影响和教育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外，主要是要结合当前中国革命的实际，正确地认识和分析无产阶级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条件，并据此发展正确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以及联合其他各被压迫阶级的策略。

教条主义是当前左派理论工作的主要缺点。当前中国左派队伍中教条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由于一般马列主义积极分子在理论素养方面的不足以及对于中国与世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从而照搬马、列、毛在以往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些理论主张和革命策略。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些主张和策略，或者已经失去生命力，或者已经被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部分是错误的，并且无论如何不能给当前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提供任何现成的灵丹妙药。比如，无论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还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设想都不能给今日中国的革命实际提供现成的答案。再比如，由于照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在若干青年左派团体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导致一部分同志或者盲目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不相信或者不敢相信无产阶级胜利的前途，或者将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欺骗误认为是中国资产阶级本质的方面、夸大中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而将中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希望毫无根据地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上。

当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勾结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妨碍中国左派进步与发展最严重的障碍。现阶段，在各左派团体的所谓“理论交锋”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恶习，即理论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在无产阶级斗争以及马列主义积极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实际问题，也不是为了认识和分析无产阶级斗争胜利的条件、树立无产阶级斗争胜利的信心，而是将理论斗争庸俗化，堕落为各个小宗派拉帮结派、站队划线并将本宗派利益置于阶级利益、马列主义左派全体利益之上的工具。

我个人认为，C小组要克服目前的困难，实现政治上的新生，再创辉煌，除了认真总结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发扬以往的优点以外，还必须与当前已经困扰中国左派的上述各

种错误倾向做斗争，才有可能不断取得进步，并且通过自己的进步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做出应有的贡献。

为此，我个人郑重提出如下建议，请 C 小组的同志们考虑：

第一，以若干同志为核心，重组 C 小组，明确成员、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参加和退出方法，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封建家长制，也反对小资产阶级个人散漫主义。要把 C 小组建设为一个战斗队，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茶馆，也不是流氓无产者喝酒抽烟发牢骚、说大话的精神疗养所，也不可以是个别同志根据个人主观意志任意使用而又可以任意改变的“政治品牌”。

第二，制定并且贯彻工作计划。工作计划要服务于当前无产阶级斗争发展的总的目的。在目前马列主义和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的形势下，要寻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要最大限度地在其他团体尚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发挥作用。工作计划绝不能好高骛远，而必须切实可行，要留有充分的余地。责任要落实到个人。每隔一个时期，个人要向集体汇报工作，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取得成绩的地方要坚持，遇到困难的地方要找原因、想办法。在条件有利并且可以直接开展工作的地方，当然应该努力开展工作。在暂时还不能开展工作但是未来应当开展工作的地方，应当首先制定调查研究的计划，并且委托专人进行。

第三，C 小组要带头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敢于向那些坚持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团体开展斗争，要向那些自觉克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团体学习和靠拢，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永远使本团体的局部利益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责任编辑、撰稿人：远航一号）

远航一号致编辑部和路石同志（关于本期红色中国时评的说明）

（2015年4月25日）

各位同志，

现在这封信不是红色中国网的工作信件，而是我个人给各位同志介绍情况、征求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信。除了发给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全体同志外，收信人还包括路石、建军节等同志。

近日，在北京的工人网（工人网目前以路石同志为首，其他成员不明）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及工人网成立10周年，举行了一次研讨会。据了解，举行这次研讨会是在会议之前数日，路石、五百二、燧鸣等同志临时商量决定的。红色中国网编辑中，参加会议的有左向前、五百二、刘杰、燧鸣。水边同志向研讨会递交了文章，由刘杰同志在会议上做了全文宣读。

参加会议的其他方面人士有时迈、王海峰、阳和平、建军节等。

在会议召开前，燧鸣同志与我紧急联系，迫切地希望我能向研讨会递交文章。我当时表示，工人网目前不需要一次撑场面、走过场的会议，而是需要认真讨论工人网的前途和工作计划；为此，参加者范围不宜过大，尤其不该有时迈、王海峰等人参加，有他们参加，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燧鸣同志表示，邀请已经发出，不能改变。我又表示，要写，我只能写真话；我与路石同志之间的分歧是深刻的、原则性的、客观存在的，一时半刻解决不了，一定要写，效果不一定好，不如放一放。燧鸣同志很动感情。我又表示，我近来上班、家务等事诸事缠身，不胜其扰，要写文章，客观上有困难。燧鸣同志仍然坚持要我考虑。当时已经是我这边凌晨两点钟。

经一夜考虑，我下决心克服困难，给工人网写信，其效果未知，但是本着对革命工作负责、对工人网负责、对路石同志和燧鸣同志个人负责的态度，还是要写信。写错了，大家批评，加深认识，没什么了不起。我给工人网的这封信，信是我自己写的，决心是我自己下的，有问题，都是我个人的责任，不怨别人。（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今日将以“要

坚决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做斗争”为题在红色中国网上发表，信中不涉及真实姓名、真实背景。）

工人网研讨会当天，燧鸣给我连发数封紧急短信，说我的信与会议主题不符，建议不向会议公布。我给燧鸣打电话，询问路石同志是否在场，是否方便接我的电话。路石同志表示，他正忙，不方便接我的电话。后来，据说路石同志的考虑是，他不希望给别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在他“背后”有某种国外的因素在支配或影响他，所以要让大家都看到，远航的电话，他也不必接（这是其他同志转述的，不一定准确）。燧鸣在电话中告诉我，路石同志的意见是，我的信不在会上宣读，而是在会后给大家传阅，我口头表示同意。

次日，我向燧鸣同志了解会议进行情况，据说，有人说，我的信主要是“情绪化”的产物，有人评价“远航是个书生，不了解国内情况”，燧鸣认可关于“情绪化”的说法，并且认为我“不懂现实政治”。关于这几点，大家看了信以后，是不是这样，可以各抒己见。

下面就我给工人网的信，做一些说明。

关于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除了给工人网的建议以外，是反对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据说，时迈在会上问，我这是在说谁，路石表示不知道。我现在可以明确讲，在传统左派团体中，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代表就是时迈集团；在青年左派团体中，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代表就是王海峰集团。这两个集团，对于目前革命和进步事业的发展，已经开始起破坏作用，将来甚至有发展为主要破坏力量的危险。

就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来说，二者一方面相互联系，另一方面又有所区别。教条主义的危害主要在精神和思想方面，而宗派主义的危害则是实际的和直接的。在当前工作中，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将个别人的、小集团的利益置于无产阶级整体利益之上。有人说，每个集团都认为自己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燧鸣同志这样说的）。这是乱和稀泥，将原则性问题（宗派主义）和一般性问题（理论和认识分歧）混淆起来。判定一个集团是不是宗派主义，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就是看这个团体对于其他团体的态度（包括非

马列、非无产阶级的团体），看这个团体对于其他团体所取得的成绩、其他团体所做出的在主观上和客观上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工作，愿意不愿意承认，愿意不愿意相互支持，乃至为其他团体的成绩而欢欣鼓舞。能做到这点，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宗派主义。不能做到这一点，甚至于对其他团体、其他个人所取得的成绩感到嫉妒、感到威胁，以粗暴的方式展开争夺，乃至积极阻挠其他团体、其他个人的工作，那就是确定无疑的宗派主义。对于这种宗派主义，我认为，是必须与之斗争的。这恐怕就是燧鸣同志所说的，我不懂“现实政治”吧。

我这里举两个例子。前段时间，刘实老人去世。据说时迈为了保证由大地微微首先做好宣传刘实老人的准备工作，刻意封锁刘实老人去世的消息，以免其他左派团体抢先宣传。再以求是学会为例。前段时间，刘杰同志在国内组织一些学校的青年学生学习《资本论》。第一次学习时，求是学会居然派人到场，指责刘杰同志未经他们认可“擅自”举行学习活动。类似这样的例子，不是孤立的，而是近年来在这个两个团体的活动中反复大量发生的。

两相比较，王海峰集团比时迈集团的危害更大。因为时迈集团没有实际的力量，没有多少工作人员，除了老左派和一些造反派群众外也没有实际的群众基础。相比之下，王海峰集团目前号称有数百成员，遍布全国，核心骨干估计至少十数人，内部组织严密，已经形成金字塔式的组织架构。据他们自己说，他们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左派的各种“错误”思潮做了清算，不仅做老工人工作不在话下，而且做新工人工作的问题也解决了。他们对于其他团体的态度，凡是属于做革命工作、直接与他们“竞争”的，他们的办法是能吞并就吞并，不能吞并就对抗和排挤，对于北京各个非“清华系”的学生团体，他们都是采取这种办法。对于各种“改良主义”工人工作团体，他们认为对他们的直接危害不大，可以统战和利用，对于 Y 同志就是采取这种方法，因此表面关系似乎还是好的。对于路石同志，他们很早就已经看不起，自认为自己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高于路石同志，但是过去两三年对于路石同志仍然采取一些利用和拉拢；而现在，显然在他们看来，路石同志的利用价值已经基本没有了，因此在这次会上，据说，王海峰对路石进行了公开“批判”。在他们内部，他们压制不同意见，对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都扣上“托派”的帽子，清除出他们的团体。

红色中国网编辑部中，与王海峰打过较多交道的，有路石、五百二、我、水边。我与水边交换过意见，王海峰不是一个襟怀坦白的人，他少言寡语、刚愎自用，说他“唯我独革”那是低估了他的傲慢和自负。三年前，我因为薄熙来问题与他发生争论，他毫不掩饰对我的轻蔑和嘲弄。

现在已经看得比较清楚，王海峰集团口头上打着革命旗号，也确实掌握着一批向往进步的青年，并且其成员有一定的理想、抱负，能吃苦，能与少量新工人形成某种程度的结合。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样的团体，决不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所需要的，他们的错误路线也不可能指引中国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工人阶级解放所需要的，是广大工人群众的发动，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在民主基础上的自觉结合，是在工人阶级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其他各被压迫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各被压迫阶级的团结和联盟；而王海峰集团，虽然摆出一副苦行僧的架势，实际上是高高在上的，凌驾于普通工人群众之上，只有他们领导和灌输工人、教育别人，决没有“从群众中来”，没有“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也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战士的真正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就其实质来说，王海峰集团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团体，而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在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绝望以后，用马列主义理论词句包装起来、以夺取权力为目的的政治密谋投机团伙。当然，这是就王海峰集团的核心骨干来说。王海峰集团的大量青年成员，其中确实有不少有理想、有抱负、想革命的，确实有不少愿意为工人阶级献身的。通过现实阶级斗争的教育，其中的一部分有可能在将来脱离王海峰集团，走上正确或者比较正确的道路。

工人网和红色中国网

多年来，工人网浸透了路石同志大量的心血。但是，坦率地说，发展到今天，工人网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说生死存亡，是就工人网作为一种实际政治力量来说。工人网当然可以像众多小宗派那样，作为一种政治僵尸，长期存在下去。但是这种“存在”，我想，决不是路石同志所希望的，也不是我愿意看到的。

今天，若干个青年左派团体已经发展起来了。与传统左派团体相比，这些青年左派团体可以说是兵强马壮、生气勃勃。相比之下，工人网作为马列毛左派最早做工人工作的

团体，今天还有哪些成员，属于路石同志有效领导的骨干还有几个？据说，左向前同志也是以“工人网网友”的身份参加此次工人网会议的。这种光杆司令扛大旗的局面，还要持续多久？

面对这种实际情况，工人网的工作路线，要不要反思？路石同志个人的工作作风要不要检讨？

本来，红色中国网与工人网是一体。红色中国网的编辑部有知识分子、学生、网络左派人士、基层工农代表，编辑部规模发展到十一、二人。虽然各位编辑同志参与工作的程度和积极性有差别，但是总的来说，都在为编辑部的发展做贡献。与其他几个传统左派团体相比，我们编辑部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与求是、进步青年网相比，我们的组织不够严密，但是内部有民主规则，有比较健康的讨论；编辑部中约半数同志在国外，但是也与国内工作保持密切联系。

在上述情况下，如果红色中国网能够坚持发挥自己的优势，国内同志能够把群众工作开展起来，同时红色中国网又是唯一的能够与乌有、旗帜网、青年左派团体、托派、进步知识分子多方面保持联系的团体，在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发展的过程中，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但是，要实现上述前景，一个基本的前提是红色中国网中年纪较长的、发挥主要作用的同志，能够给其他同志做出表率的作用，同时切切实实地把其他同志当自己人看，当作一个集体的共同成员看。

在这个意义上，坚持民主集中制，不仅是维护章程和纪律的需要，同时也是促进红色中国网团结和进步的需要。红色中国网/工人网中，除了路石、我参加过1989年运动，左向前同志富有基层斗争经验以外，几位青年同志都是比较缺乏政治经验的，新愚公、柳实两同志又在海外。并且，无庸讳言，红色中国网编辑部内部又有分歧，认识不尽一致，政治观点多种多样。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把红色中国网的工作拧成一股绳，共同向前走？除了切实遵守章程以外，有事就要和大家多商量，要让各位青年同志尽可能地多参与工作、多思考问题，又要让大家感觉到自己都是红色中国网的主人。所以，凡是以红色中国网或红色中国名义进行的工作，都要经过大家商量，必要的时候，要表决通过，或者事后批准。如果

不是这样，而是采用路石同志的方法，认为凡是国内的工作，国外同志就不必管，也不必遵守章程，自己拿着“红色中国编委会”或者“工人网”的招牌，想用就用，想开会就开会，想署名就署名，那么且不说我的想法，像水边、刘杰、玉表、而东、新愚公、柳实等同志，凭什么要把红色中国当作自己的事业，凭什么不可以认为那些都是你路石同志自己的事情、与旁人无关？

说实在话，现在不是革命高潮，是资本主义正常统治时期。有家庭的，老婆、孩子、单位一大堆破事。还在上学的，写论文、找工作压力都是巨大的。在资本主义压迫之下，甭管是教授博士还是底层工农，还是像路石、燧鸣这样的半失业的流氓小资产阶级（阶级成分定性、无贬义），各有一本难念的经。要哪个搞革命，不做出一些个人牺牲都是不行的。要坚持革命工作，除了革命理想以外，就必须有同志之间的相互关心、爱护和尊重，必须有民主的工作作风，必须有个人对集体负责的工作态度。

反之，按照路石同志的方法，我的事你们都不要管，你们的事我也不管，这还像集体吗？我与路石同志上一次通电话，路石同志是这样评价我们红色中国网工作的：“工农频道的文章，我从来都不看！”或许我们水平低，不了解国内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但是，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工人工作的老同志，对于工农斗争宣传，就是这样的态度吗？

这里，我要顺便再提一下红色中国周刊的问题，并希望引起左向前同志的重视。众所周知，红色中国周刊在创立之初，明确是受红色中国网领导的，当时叫红色中国网周刊。后来，在路石、左向前同志与新愚公同志发生分歧以后，左向前同志自行将红色中国网周刊改名为红色中国周刊。当我询问此事时，左向前同志说，他的理解是红色中国周刊是受“红色中国集体”领导的。

那么现在，“红色中国集体”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红色中国周刊事实上仅由左向前同志一人负责。由于红色中国网的现状，其他同志不仅不能参与红色中国周刊的工作，事实上也不好给左向前同志提意见。据我了解，路石同志事实上对于周刊也是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

请左向前同志认真考虑，这种情况，正常不正常？你个人做红色中国周刊工作很辛苦，平常难免出差探亲，或者因病需要休息；这些情况多了，会不会影响周刊工作？政治上，你个人有没有把握，保证周刊的政治路线长期正确？左向前同志曾经在不同场合表示

过，他坚持一个人周刊工作，就是为了一旦出事，他个人可以把责任全担了。左向前同志的革命勇气可嘉，但是这不是对革命工作负责任的态度。首先，我们工作的大前提，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不轻易牺牲。要不要冒出事的风险，不是个人凭感觉、凭勇气，而是必须从革命工作大局出发。其次，就算有出事的问题，冒多大风险，由谁来冒风险，也不是个人的事，而是集体的事。

请左向前同志再次考虑我的建议，正式成立红色中国周刊编辑部，制订工作章程，分配工作任务。该编辑部成员，可以完全由左向前同志信任的同志组成，明确与红色中国网独立但是相互合作的关系。

名正而言顺，言顺而事成。就革命坚定性来说，左向前同志在红色中国网编辑部中是站在最前列的。我相信，我提的这些问题，左向前同志是一定会回答并且回答好的。

Y 同志

目前，青年左派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成长过程中，这些青年同志不可避免地会沾染一些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作风。作为青年政治积极分子，在参加革命工作初期，思想上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除了怕苦怕难以外，有一些个人政治抱负或者说野心，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也是人之常情。我与路石同志都经历过这个过程。但是，凡事都有个度。真正为了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的，在成长过程中、在斗争过程中，会逐步克服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缺点，会逐步消灭个人英雄主义和政治野心，逐步地使自己的所作所为服从于更加高尚的目的。

燧鸣同志说，我不懂现实政治。我是才疏学浅，但是还算是搞过革命、蹲过监狱，读过几本书，混过自由派，当过马列毛，还不算百无一用是书生。我自己不敢说有多无私，但是积我二十多年政治经验，哪些人是真正的心底无私天地宽，哪些人是口头革命喊得最响而实际上自我膨胀到极点，我还是有点识别力的。

在当今中国左派诸多团体中，真正有理想、有水平、有办法，有奉献精神，又绝没有私心，一心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不仅不图个人的物质利益，也不贪图权力和名誉，而且不谋求小集团的特殊利益，首推 Y 同志。与 Y 同志相比，我差得不是一点半点。

我个人认为，红色中国网要有前途，在国内工作方面，就必须向 Y 同志领导的团体靠拢。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并且还是由于路石同志用人不当造成的历史原因），路石同志对于向 Y 同志靠拢，相当地不情愿，表面上的理由是因为他认定 Y 同志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不得而知。

另一方面，路石同志对于时迈、王海峰的问题，不是完全没有认识。他曾多次对我讲，时迈心胸狭窄。有一次路石同志去旗帜网那里开会，提了一些意见，临走时，时迈追到门外对路石说：“要不然以后我把旗帜网交给你，好不好？”近年来，王海峰冷落路石，路石很伤心。王海峰需要利用路石时，又会把一批他们“清华系”的外围学生送到路石那里，让路石带着搞调查，乃至管吃管住，留下一大堆烂摊子，路石抱怨不已。奇怪的是，像时迈、王海峰这样的人，越是歧视路石，越是对他呼来喝去，路石越是不敢得罪他们。对于时迈，路石在各种左派争论中无原则地站在时迈一方。对于王海峰，凡有重要场合，路石都必然要待之若上宾；王海峰让路石做什么事，路石就做什么事，比做红色中国网的工作还痛快。至于王海峰对路石的冷淡和蔑视，路石也有自我安慰的方法，逢人就说，“王海峰是我一手看着长大的”。

路石同志啊，作为你二十多年的老同志、老战友，我是不忍心看见你走进政治的死胡同。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你我二十多年交情，我为什么可以下决心破裂？那是因为我看到，你继续这样走下去，会毁掉你自己的政治前途；我和其他同志继续追随你，也会毁掉我们的政治前途。

你我上一次通话，你还说过，我就是喝醉了酒，头脑也是清醒的。

别人不了解我，路石同志应当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重感情的，但是做政治决定时，还没有犯过“情绪化”的错误。

如果路石同志愿意正视上述问题，组织上接受并且实践民主集中制，政治上与时迈、王海峰等宗派主义者划清界限，积极向 Y 同志靠拢，我愿意拥护路石同志继续做红色中国集体的领袖，我可以建议选举路石同志为红色中国网主编，我可以担任副主编或者普通编辑。

兹事体大，请路石同志一思，再思，三思。

远航一号

2015年4月25日午夜

路石致编辑部（关于本期红色中国时评的说明）

（2015年4月26日）

各位好！

周日在北京讲课一天，下课后直接上了火车，今早到达河南，回家后看到远航来信。由于可能涉及他重新提交书面发言稿的问题（统一的截止时间是今日中午12点），故匆匆写来。

远航的批评、建议甚至埋怨，首先是坦诚的，我感谢这份感情。时间关系，我暂草草回应几点。

第一，远航信中所涉及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尽管描述、定性有不妥或不甚准确的地方。比如我跟远航个人私下就某人在性格上的评价，没有必要作为其人宗派主义或者教条主义的佐证，公布于大家令我尴尬。Y至始至终都是做改良工作的，当年我跟她合作的武汉、西安项目因我的放任自流都无果而终，主要责任在我，我也当面承担过责任，人家也表示了谅解，只是我不能再轻言合作了。倒是在当时合作期间，远航对她的改良性质的工作不以为然，但两年前远航突然说Y是彻底革命者，我仅仅是表示了迟疑罢了，即便如此，我和左向前仍然积极配合他们在河南开展工作。十多年来，我先后带过近百名学生调研过老工人和企业改制，这些学生中只有王海锋今天还在始终一贯地关注工人，我给一些人表述过这个现象只是想说明其存在的稀缺性，不能把教育学生看得过于浪漫。的确有人在我面前提起他时说过是我培养的这种话，我都立刻做了纠正，五百二大概也听到过的。我深知要说培养某人是需要资格的，否则会成为人家的笑柄。不是我要谦虚要矫情，我的确没有这么想过做过。我倒是刻意给工人网培养过人，那正是远航信中提到的我用人失察的人。这些就不多说了，我也不做辩白了，不算大问题。就像远航说的，“没什么了不起”，我能承受。而需要郑重答复的是远航在来信的最后提出要推举我为“领袖”的

事。先不说他要我当“领袖”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我自己的资格和能力首先决定了我不是这块料。正像远航信中说的，我是个“流氓小资产阶级”，哪有资格领导大知识分子；能力上大家也略知一二，我自由散漫，什么都管不好。就像我的一位老朋友说的，老张是只到处坐窝不下蛋的鸡！我这里把自己说高点儿：我是个提着酒葫芦的在醉意朦胧中追求高尚的独行侠。现在已经是一个老态龙钟的朝圣者了，还想继续去探路，甘愿让后来者踩着尸体前进，做个铺路石，如果失败了，掉进了悬崖，可以使他人引以为戒。所以我追求“高尚”，但不追求做领袖。

第二，为筹备 23 日座谈会，我和五百二、燧鸣做了一些分工。我曾提议由书记燧鸣在红中网编辑部写个说明，看各位编辑谁愿意提供书面发言稿（要求直接说明是真名实姓发布，或用曾用名，但不能用网名）五百二认为不妥，大概是考虑到红中网是境外网站，怕还未开会因通信就有了意外，想来是有些道理的，我便提议由燧鸣给主编和代主编两人说明一下这事即可（用短信不用邮件），我们三人都同意照此办理。这样，燧鸣负责通知在京的大君和刘杰，以及负责接收潘老师、水边和远航的书面发言稿，由五百二提名并通知了五个人，我负责向左向前和办公室人员做说明。议程安排是，先由左向前代表工人网网友简单回顾工人网的历史当做致辞，接着由人代读三位学者的书面发言，然后上午由五百二主持现场参会人员发言，下午讨论和辩论由我主持进行。

远航的书面发言是最早到达的，他能来稿我和大家都是很高兴的，但当时现场的人看了内容后，认为跟原来商定的主题有很大不一致（原来设定的是借工人网十年回顾工人阶级十年来的状况，以便做个有价值的总结。远航的发言稿直接提出开会不合时宜，提出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问题，并提出解决工人网组织问题）。经现场人员商议，认为如果上午就宣读远航的发言稿，可能会导致偏离原定的议题，也有人建议只阅读跟议题有关的内容，但又有断章取义之嫌，最后决定放在下午我主持辩论的时候，给还没有看过的人传阅一下，并附上了先前远航给编辑部关于同我发生分歧的信。附上这封信是我提议的，我考虑到远航已经在送来的发言稿中提到了这封内部通信，如果传阅的时候不附这封编辑部内部通信，一些人会不知所以然。其次，远航关于着重做好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以及新工人工作

的主张，跟当天参会的绝大部分人的主张是一致的，这样也许可以讨论得更热烈一些。真理越辩越明，我也做好了辩论的准备。当然，结果也没有按设想的路子走，主要变成了对我的质疑和批评。我不能既当主持又当辩论一方，很快就交由五百二继续主持了。坦率地讲，除了我觉得在辩论的时候，一些人没有避免我们小资产阶级的夜郎自大的毛病外，辩论本身如果能很好地进行下去的话，我写综述报告的时候内容会更丰富一些，可读性会更强一些。会议结束后有位参会者猜测说，也许什么话勾起了一些人对我挺薄的厌恶所致（大意）。也许真有些道理的。

最后，我还是希望远航把姿态放高一些，借这次座谈会内容需要向外发布之际，表达一下自己对工人阶级状况和从事工人事业的相关看法，以及我们团结一致从事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态度。尽管远航在自己的各种文章或通信中都已经有所表述了，但那毕竟是个人的看法和思想，而不是在一个群体中的态度。远航不是也常说要给大家以信心嘛，我认为集体亮相也是有这个作用的。望考虑。如果愿意重写 500-1000 字的书面发言稿（远航原来写的发言稿以及刚刚发表的时评显然距离座谈会的主题较远，如果附在综述里会导致广大读者过度解读，把我们这次仅限于观点交流所正常表现出来的分歧，视为一种分裂。至于要追究我在工人网十年来应担负的责任以及工人网组织路线上的问题，完全可以考虑另议），如果要求今日 12 点前，时间就过紧了，远航如果愿意写些话，交稿时间可以延至北京时间 30 日凌晨 6 点前也还来得及（原定将三位未到现场的发言稿直接附在后面，不做拆解）。

顺致问候!

路石

2015 年 4 月 27 日北京时间上午 10 点半

附：

关于五一会议综述稿的几点说明

一、与会者统一提交书面发言稿，字数在千字左右，可各抒己见，综述稿将以每位发来的文字稿为依据进行综合。题目暂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状况近十年来的变迁（或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十年变迁）

二、为便于综述起来准确把握各位的观点，各位在陈述问题时希望按下列三部分进行：

1、关于新工人的基本状况；2、关于老工人的基本状况；3、关于新老工人的结合问题以及本人对新老工人在阶级成长过程中角色作用的定位。

三、关于稿件的处理：1、各位交稿截止时间为本月 27 日中午 12 点前，否则可视为不愿公开自己的观点。稿件统一交张耀祖，email: zyz1949@hotmail.com 或 QQ:790358698。

2、张进行综述整理后将于 30 日凌晨 6 点前将综述稿返送给各位；3、各位可将综述稿中涉及本人的观点言论进行修改完善或增减（请用 word 修订格式，并在标题前加上个人的姓名，用分号隔开，同时可对综述稿提出各种建议附在文后），于 30 日下午 6 点前再直接发送给老张；4、综述稿正式发表时间暂定为五一中午 12 点前。

注：此说明由 fcs、赤旗各负责转给自己原来所通知的人员，佃耕负责转给办公室人员，并向自己所通知的人提醒注意稿件处理的各时间节点。

远航一号致编辑部和路石同志（关于本期红色中国时评的说明）

（2015年4月26日）

感谢路石同志的答复。路石同志在这封信中已经初步说明了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读后，有助于各位同志了解全面的情况。

关于这次工人网会议，燧鸣同志发来的短信，由于短信篇幅的关系，确实没有详尽说明会议主题和对发言稿的要求，如燧鸣同志短信中没有包括会议要求中的二、三两项，仅笼统地说是关于过去十年的回顾；并且我与燧鸣同志讨论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路石同志近来对于工作前途感到迷茫，正在努力寻找新的方向。正是在这样的印象下，我根据我所理解的工人网最迫切的问题，写下了现有的发言稿。

如果燧鸣同志当时就让我了解了会议要求的全部内容，并且告知我发言稿必须严格按照会议组织者设定的主题来写的话，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我将不会向会议递交发言稿。正如我在两封信中所说，我的看法，这次会议的时机是不恰当的。当然，通过这次会议，通过各方面的发言，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马列毛左派的几个方面目前所做的工人工作以及在这些工作中所得到的一些认识。但是，这些有益效果，通过其它方式，也是可以获得的。另一方面，工人网目前迫切需要的是，由一些历史上与工人网有关的同志，坐下来，开诚布公地总结经验教训，从无产阶级革命总的需要出发，根据我们现有的实际条件，探讨工人网新生的方法，这项迫切而紧要的工作恰恰没有做。

另一方面，我反复强调，我与路石同志的分歧是深刻的和原则性的，不是表面的和偶然的。即使在路石同志的回信中，也可以看出我们对于 Y 同志、王海峰、时迈等人看法的不同，这间接反映了其他各项分歧。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表面的团结是无益的，而且在路石同志退出红色中国网后，也不存在维持表面团结的组织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负责任的态度，是承认这种分歧，让其他同志了解这种分歧，从而有利于我和路石

同志各自在政治上保持主动。比如，更有利于路石同志处理与时迈、王海峰的关系，也有利于路石同志处理与一些地方左派群众、项观奇等人的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我无法向这次工人网会议递交新的发言稿。当然，会议组织者完全有权利不发表我原来的发言稿。另外，对于工人网会议发表的其他同志的发言稿，我将建议红色中国网予以转载、配合宣传。

远航